

试论法显

靳生禾

我国晋代高僧法显，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卓越的翻译家。

然而，法显在历史上毕竟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当时世俗社会中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也不可能多说到他。这使他的生平资料十分缺乏，其著作的研究和发扬，亦不能不受到局限。从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一千四百余年间，除了北魏的郦道元、清代李光廷等少数人注重法显著作的学术价值外，不过个别僧传为其敷衍有传；他的著作《佛国记》，则不过收录于《大藏经》和数家丛书而已。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崛起，西方学者首先重视法显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则到民国初年始有研究法显著作的专著，稍后日本学者相继而起，南亚各国学者，也开始注意法显著作的研究。法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他的《佛国记》在历史上的影响既深且巨。

一 法显所处时代及其生平

法显大约生于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卒于420年（刘宋永初元年）^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东晋时期。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已有五个世纪。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学界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称西汉末，指大月氏王使伊存在长安授浮屠经事；一称东汉初，指楚王英在洛阳信奉了浮屠教。然以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

个范畴而论，似上述两说都是不确的，因为它们所说的只能指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中原地区的佛教最先概由西域传入，接受天竺佛教者其先鞭而成为向中原传播的桥梁的我国西域地区，如南道的于阗（和田），如北道的龟兹（库车），自远在中原之先了。由此说来，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应在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毗卢折那来于阗建寺传法之际，时当公元前74年，即大致相当“元狩得金人”的西汉全盛时期^②。

早在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一地，已有佛寺42座，全国多至180座，出家僧尼达3,700人^③。到了东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更加尖锐激烈。统治阶级需要利用宗教麻醉劳动人民，大力提倡佛教，以维持其经常在动摇的统治地位；同时，连年的兵荒马乱，生死无常，也使劳动人民容易接受神佛保佑、西方乐土的宣传，信奉佛教的人就更多了。这就使佛教应运而兴，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于阗、龟兹、凉州（武威）、长安（西安）、洛阳、彭城（徐州）等地，成了传播佛教的中心，敦煌出现了佛教艺术。

法显俗姓龚，晋平阳郡武阳^④人（今山

① 参贺昌群考证，见《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第33、34页。

② 参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四、五章。

③ 《佛祖统纪》。

④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高僧传》卷三。

西临汾)。法显有兄三人,都在童年夭折了,父母惟恐“祸以次及”,当他刚满三岁的时候,就送到佛寺度为沙弥。老人以为儿子有了神佛荫庇,或可长大成人。法显出家后,信奉佛教很虔诚,后来虽有他母亲的召唤,父亲的病亡,叔父的威逼,他都不肯还俗。这里可见他从小性格的倔强、深沉,一旦选定道路,就不浅尝辄止。二十岁时,受了大戒,从此对佛教更加诚笃,行为也更加严谨。他为人聪明正直,有志有恒,又循规蹈矩,史称“志行明敏,仪轨整肃”^①。这是他青年时代的一幅风貌。

法显进入中年以后,即东晋末叶,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佛教在空前发展;一方面由于佛教组织扩大,寺院地主阶级的发展,加之佛经翻译不敷需要,尤其律藏未备,影响到僧伽制度的建立,又是佛教非常混乱的时期。当时佛教界的混乱现象,《魏书·释老志·沮渠牧犍传》、《晋书·司马道子传》、《弘明集·释驳论》、慧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高僧传·法相传》等,从不同角度都有反映。《弘明集·释驳论》说:

今观诸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多皆不称服,行多违法。

这是道恒对当时佛教界淋漓尽致的暴露,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这些现象,激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佛教内部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企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矫正时弊,扭转潮流。东晋佛教界最大的组织者和宣传者道安(312—385),在襄阳致力于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准则。自制三科,所谓“僧尼轨范,佛法宪章”^②。长安的佛教首领鸠摩罗什(343—413)日出十诵律,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助出十诵律^③。庐山佛教大师慧远(334—416),又是寄书劝友人翻译戒律,又是派遣门徒出国寻求戒律^④。这些佛教界的代表人物都呼吁传译

戒律,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客观要求。法显的西行,正是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他在《佛国记》一开始就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至天竺寻求戒律。”这也足见他对佛教社会的现状是很不满的。

公元399年(晋隆安三年),法显已经六十五岁,从长安出发,通过西域,越帕米尔高原,从中亚到南亚,留学天竺,学梵书梵语,寻求和笔录了大量佛教经典,然后纵渡孟加拉湾,经师子国(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过耶婆提(苏门答腊),绕行南洋回归祖国,漂抵山东半岛的牢山登陆,再取陆路,最后于413年(晋义熙九年)回到东晋首都建康。这时,法显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他在外凡十五年,历经三十多个国家,行程约四万里。《佛国记》写他旅程中经历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戈壁;“毒风雨雪,飞沙砾石”的葱岭;杳无人烟,“道路畏白象、师子”的迦维罗卫;“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的印度洋……。同行的慧景、道整等十一人,有的半途折回,有的亡殉国外,有的留住不归;而贯彻始终,排除万难,返归祖国的,唯法显一人。所以,慧皎《高僧传》说“发迹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惟一”。法显之行,历时之长久,行程之遥远,经涉之艰险,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法显回到建康,住道场寺,得到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的合作,着手翻译他携回的天竺佛教经典。他不顾耄老,无视终之将至,大约用了五年时间,进行了紧张勤苦的工作,即使大年盛节也不肯休息,终于译出《摩诃僧祇众律》、《大般泥洹经》等六部六十三卷,计一百余万言^⑤(他生前未及翻译的,后来亦由佛驮什、求那跋陀罗和宝云等陆续

① 《高僧传》卷三。

② 《浙东经序》。

③ 《晋书·鸠摩罗什传》。

④ 《高僧传·慧远传》。

⑤ 《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

译出^①)。同时,法显写成他的游记《佛国记》。后来,他又转荆州辛寺,已临暮年,不久就去世了,终年八十六岁。

我们追溯法显生平的时候,应该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他以六十五岁高龄,能有开始一次徒步万里孤征的勇气;七十一岁尚有开始学习外语的恒心;八十岁更有开始翻译生涯的毅力,以至著有光辉成就。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至今尚能使我们感奋,给我们以鼓舞。

二 伟大的旅行家

法显在《佛国记》说,他足迹所到,“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这应有两重意思,其一是他的旅行是同汉代探险家有关系的,即在前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上进行的;其二是他的旅行范围超越了汉代探险家,即发展了前人开创的事业。

张骞于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到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大宛西边草原)、大夏(当今阿富汗),成为打通亚洲大陆国际路线的第一人^②。甘英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罗马),到了地中海东岸,以远了西方交通路线,成为打通亚、欧国际路线的第一人^③。然而,博望侯到大夏始闻有印度,而未到印度。甘英虽到达亚洲西部,但往返均取北路,未达南海。据历史文献,公元前二世纪后叶已有汉使从广东下海去南洋的记录^④。公元二世纪更有中国与天竺、大秦等进行海上贸易的记录^⑤。但是,这些航行,即使到达印度,似一直沿海岸行进,旅程情况均无确切记述,更无航海者名字。因此可以说,法显是我国历史上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汉代探险家固然均未到达印度,亦无关于印度的确切知识,后来汉、晋间中国最著名的游方僧人,最远也不过到达印度西北边陲。三国时代的朱士行,足迹仅达于阗;东晋初的康法朗西行未闻到达印度;后来于法兰、于道邃半途病卒于

中南半岛;法领、法净远适西域,但无游历地域的记述^⑥。这又说明,法显是我国历史上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当法显还在毗荼、祇洹精舍的时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僧俗人民就赞叹他们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⑦。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说到有史以来访问斯国的中国人时,首举法显,称誉他是“伟大的旅行家”^⑧。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沙勒说:

“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⑨

法显这次陆海大旅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中国旅行家的地理视野由原来仅限于中亚和西亚,扩展到南亚和南洋了。第二,法显之前,西行的人皆取西域陆路;法显之后,则多取南洋海路了。对比法显前后中国人的交通手段,由原来主要是限于传统的陆路,迅速地向上交通有了飞跃地发展。第三,法显在海外的友好活动,为国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国际友好与文化交流。

三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法显出国旅行,志在寻求律藏,《佛国记》有三处直接提到此事。他在全部旅程中,始终注重的是参访佛迹,寻求经典。法显从国外取回的梵文经典,《佛国记》具体说到的,有在中天竺得到的《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杂阿毗昙心》、《楞伽经》、《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计六部;有在师子国得到的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

- ① 《高僧传·佛驮什传》、《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五上。
- ②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 ③ 《后汉书·西域传·班超传》。
- ④ 《汉书·地理志》。
- ⑤ 《后汉书·西南夷传》。
- ⑥ 《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康法朗传、于法兰传、于道邃传、卷六慧远传。
- ⑦ 《佛国记》毗荼条、祇洹精舍条。
- ⑧ 《锡兰简明史·绪论》。
- ⑨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居住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觉醒》周刊1956年第35期。

《杂阿舍》、杂藏经，计四部。两地所得共十部。其中法显所译和参与合译的，计有《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六部六十三卷^①。

这里，有三点尤应提及：第一，就上述法显所传译佛教经典本身来说，这些一般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重要戒律经典，如《长阿舍》就是一部四十卷近百万言的大律藏；《摩诃僧祇律》，即大众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成为后来中国广大佛教徒引为立身的准则。《魏书·释老志》说：“（法显）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辨定之，谓之僧祇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方等般泥洹经》，即通称“六卷本大般泥洹经”，是当时在以建康为中心的佛教界最早传布的大般泥洹经，影响很大。竺道生因读是经而立一阐提皆得成佛义，适应了当时佛教发展的客观要求，却也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攻击，在佛教界引起很大的波澜，直至昙无讖译出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提出了此说在天竺佛典中的根据，这场风波才渐平息，可见此经影响之大。这些都是法显传译经典在佛教史上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我们评价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时，应予注意的。

第二，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中原）的初期，几乎全部来自西域，并非直接从佛教发祥地天竺传来。法显之前，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南朝刘宋（北朝北魏）前，西域来华译经僧已达65人，译经436部1615卷^②。这些译经僧一般是大月氏人，或于阗、龟兹人，他们依据的底本是西域各族语言的译本^③，世称“梵书胡本”。它们经过辗转数译，对比梵文原著，已有不少讹误增损。法显亲到天竺，留学巴连弗邑（巴特那），学习梵书梵语，正本清源，把许多梵文正本经典（实则当地多系口传）记录下来，携归中国，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这是以梵译汉的开始。法显成为中国历史上留学海外，以梵译汉的

第一人。

法显在这方面的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法显之前，中国僧人是赴西域求胡本经典；法显之后，中国佛教界便不再重视胡本，而尊信梵文正本经典了。从此说来，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在东方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正）路。”^④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说明此事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第三，天竺佛教经典，当初原是师徒口授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也是如此。西汉的秦景宪受月氏王使伊存教授浮屠经就是口授的。法显去天竺时，北天竺各国也还是口授，并无文本。法显深入当时的佛教中心——中天竺的巴连弗邑，把许多口传佛典记录下来，这对于丰富中国文化宝库，对中印两大文化的交流，对东方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发扬，都是有贡献的。这在佛教史上，在东方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天竺佛典本来盛行口授，以至在佛教的故乡保存下来的文字经典寥寥无几，这就使法显的事业具有了特殊意义。

此外，还应注意的，中国不只是世界文明古国，而且从上古直至十五、六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侵以前的明朝前叶，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领域，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由于西方殖民者东侵，明朝中期以后不得不实行“海禁”和清朝的“闭关自守”一小段时间外，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充分开放的。我们既善于发明创造，又勇于虚心向别人学习。法显的事业，从历史的一个侧面很好地

① 《出三藏记集》上卷第二。

② 依《宋碓砂藏经》统计。

③ 如大乘教经典的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大部，在法显以前全部是由西域各族语言的译本译成汉文的。

④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证明了这一点。

四 《佛国记》的学术价值

法显回国后的第二年，即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写成他的游记。两年后，他又作过补订，即跋文所说：“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

法显的游记，最初以《佛游天竺记》之名著录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称《历游天竺记传》，唐《隋书·经籍志》以《法显行传》之名著录于史部，又以《佛国记》之名著录于地理部。道宣《大唐内典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袭用《历游天竺记传》。杜佑《通典》为避唐中宗讳称《法明游天竺记》。宋以来各《大藏经》称《法显传》。明以来诸丛书称《佛国记》，还有称《三十国记》的。这说明此书当初无正式名字，上述均后人所命名；也说明千多年来历代撰述家对它的注意。

汉代自张騫以来，我国探险家辈出。然张騫、班超、甘英均未撰写游记；三国时代的朱应、康泰奉命出使南洋，前者有《扶南异物志》，但书已亡佚，后者有《吴时外国传》，也只能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等书散见其节文。法显则成为中国历史上广游海外留有游记的第一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著游记者很多，如晋昙景有《外国传》，北凉法盛有《历国传》，智猛有《游行外国传》，宋昙无竭有《历国传记》，宝云有《游履外国传记》，道普有《游履异域传》，梁慧超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北魏道药有《道药传》，慧生有《慧生行传》，宋云有《纪行》，等等。然而，这些书都已亡佚；只有法显的游记，完好地保存下来。它具有如此独特的生命力，说明千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看重和珍惜。

《佛国记》，全文13,802字，跋文178

字，共计13,980字。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说“九千五百余言”^①，贺昌群先生亦持此说^②，都是不确的。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收录于《宋碛砂藏经》通字函，称《法显传》。抗战前中华书局版《辞海》“大藏经”条称：“南宋碛砂版尚存孤本，藏西安卧龙、开元两寺（缺一百七十三卷），可谓稀世之宝矣。”惟近来发现太原崇善寺亦存有一部此经，亦有佚卷，在全部590函6,362卷中现存562函4846卷。如此说来，我国现存《宋碛砂藏经》就远不是“孤本”了。此外，据日本大谷大学访华朋友称，该校也存有此经残卷。

一千多年来，《佛国记》不仅为佛教徒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也为一般学术界所重视。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就引录《佛国记》达13处^③。唐宋时期，对法显著作重视是不够的，杜佑在《通典》中一方面说“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传游历传记”，所列诸书，首举《佛国记》；但他又笼统地批评说“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纰缪，故多略焉。”对于法显游记，这个批评显然是不公允的。出自佛家手笔的《法苑珠林》，也说“法显虽外游诸国，传未可依，年月特乖殊俗，实为河汉。”这说明法显游记流传下来，是经过了历史磨难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对法显游记，均未著录。明清以降，对法显游记是重视的，《秘册汇函》、《津逮秘书》、《说郛》、《学津讨原》等丛书，皆编入《佛国记》。李光廷著《汉西域图考》，以《佛国记》为重要参考书。民国初年，丁谦撰《佛国记地理考证》，这是我国研究《佛国记》最早的专著。继而南京支那内学院刊行了《历游天竺记传》，并作了附注。此后研究《佛国记》的主要著作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

① 《法显传考证》上编第二节。

②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序》。

③ 《水经注·河水》。

法显《印度巡礼》、阎宗临的《佛国记笺注》（未刊印）等。

在国外，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佛国记》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首先为欧美学术界所重视，陆续被译为法、英等西方文字。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夏德、苏联的阿瓦林、美国的洛克希尔等，在其著作中都常征引和提到《佛国记》。《大英百科全书》列有“法显”条，对法显及其《佛国记》有较详细的评价^①。《苏联大百科全书》也列有“法显”条^②。在东方，日本有堀谦德、羽溪了斋、松本文三郎、小野玄妙等众多学者，对这部书均有直接或间接的研究。足立喜六参考了《佛国记》的多种版本，汲取了各国学者研究成果，有巨制《法显传考证》。近年来，南亚各国学者亦开始重视《佛国记》的研究，如印度的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斯里兰卡的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印度尼西亚的南榕·沙勒等，他们编纂的南亚史书，莫不以《佛国记》为重要的原始史料。《佛国记》所以见重于世界学术界，其学术价值大凡有三：

（一）此书着重记载了中古时代西域和天竺的佛教发展情况，成为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原始资料。譬如，据法显记载，我们知道当时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旁遮普和孟加拉邦很盛；在马土腊不过刚刚发展；在中央邦印度教占优势，佛教则很不普及，而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当时还是融洽的。印度学者认为，不利用法显和玄奘等人提供的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③《大英百科全书》说，当时在西欧罗马帝国正在崩溃的时候，法显的著作乃是佛教在东方——中亚细亚和印度兴旺发达的一个有价值的证据。并说他的笔锋严谨翔实，绝大部分的记述经得起验证^④。

（二）中古时代，西域和南亚各国佛教达于鼎盛，它们的文化集中地表现在佛教方

面。以斯里兰卡为例，迄今在全岛发现的2,500多处石刻铭文，其内容几乎全部和佛教有关。《佛国记》记载了它们的佛事，也记载了其历史、地理和文化，成为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中古史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印度等国缺乏系统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西域各国则湮灭已久，传记无存，法显的记载就更加可贵了。诸如，《佛国记》有关古鄯善国的九十八个字的记载，反映了这个古城的地理方位、社会文化、人民习俗等基本情况。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籍中有关鄯善的唯一历史文献。从《佛国记》有关中印度的记载，能够看到笈多王朝的土地制度之一斑，是当时印度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有力佐证。恩·克·辛哈等认为：“中国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⑤《大英百科全书》则说《佛国记》是中国记述印度最早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⑥。《佛国记》所记斯里兰卡最早有人定居及其繁荣，归于这个岛国地处国际海路要冲，商业贸易发达，这显然比差不多同时产生于当地的《岛史》、《大史》等历史文献主要归于神话奇迹，显然可信得多。

（三）法显在书中，对他所经各地的行程、地理特点、山河形状、航海航船等，常有具体记述。如他对印度洋“信风”的记载，是我国古籍中关于信风的最古最原始的确切记录。他对所乘远洋航船的具体描述，是我国古籍中关于远洋航船的最古最原始的确切记录^⑦。这些都对扩大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下转23页）

① 第九卷第34页。

② 第四十四卷第550页。

③ 恩·克·辛哈等著《印度通史》第一册第二章。

④ 第九卷第34页。

⑤ 《印度通史》第一册第二章。

⑥ 第九卷第34页。

⑦ 康泰《吴时外国传》极简略地提到扶南船，此书已佚。

把曹爽集团定为政治上的革新派是很不妥当的。

和曹爽集团相对立的司马懿集团，是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有建树。司马懿善于领兵打仗，他和他的兄弟司马孚领导军屯生产功效卓著，这在上文已详，不再重复。司马懿拔擢人才，也着重于事功。如曾为“屯田掌候人”的邓艾，被司马懿破格选用，后来成了广建军屯的干员，魏国的著名将领，在灭蜀的战役中立了大功。

“好立功业，善用兵”的州泰，被司马懿选用后，“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后来也成了魏国的名将，“所在有筹算绩效”^①。何晏评司马师说：“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②，也认为他长于政务。司马懿集团中的人大多善军事，重视农业生产，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爽集团。

综上所述，司马懿集团与曹爽集团的斗争并不是门阀与庶族的斗争，而是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之间的斗争。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对历史的发展来说，事功派掌权要比浮华派掌权有利。司马懿的政敌王凌的儿子王广说：

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何晏)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③。

吴国人张悌也说：

(上接29页)

中西交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瑰宝。

法显毕竟是一位僧人，十足的唯心论者。他的全部行止，在致力于佛教事业。但是，他活动的积极的客观效果，已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动机(这正是我们研究这位古代人物

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五、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④。

这都可以说明司马懿集团是一个较好的政治集团，它消灭曹爽集团和取代业已腐化的曹魏政权是有进步意义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门阀地主的事功派虽较浮华派为好，但在那时整个门阀地主阶层是不是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我们认为，门阀地主所役使的劳动者是世袭的农奴——佃客、部曲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奴隶制在社会上还严重的残存，以门阀地主为代表的十分牢固的世袭农奴制度对残存的奴隶制度起有力的肃清作用，那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免奴为客、免奴为部曲的现象就是这种作用的表现。因此，直到南北朝的前期，还不能说整个门阀地主是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也很难说庶族地主比它更进步些。因为这种看法在我们过去的文章中已有论述^⑤，本文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 ① 《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注引《世语》。
- ② 《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
- ③ 《三国志》卷二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 ④ 《资治通鉴》卷七八，景元四年。
- ⑤ 参看郑欣：《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载齐鲁书社出版《历史论丛》第二辑)，《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门阀政治的几个问题》(载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

的着眼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导人们：对于任何历史现象，必须放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去看待，“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①。如此说来，法显在中国历史上抑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人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